

农民工

周刊

责任编辑:程莉莉
新闻热线:(010)84151095
E-mail:grbnmgzk@163.com



交谈中有那些注意事项?

在和别人交谈时,即使是再熟悉的人,也要注意起码的礼仪要求。以下问题在交谈中应加以注意:

1 交谈的态度

谈话时态度要诚恳、自然、大方,直接说明来意或交谈的目的。东拉西扯地闲聊,既浪费时间,又会使对方怀疑你的诚意。如果有急事要离开,要向对方打招呼,表示歉意。

2 不适合的谈话内容



一般不要涉及疾病、死亡等不愉快的话题,不谈论人听闻、迷信或黄色淫秽的事情。违背社会公德、生活堕落等话题,也不适合交谈。

3 其他注意事项

遇有争论,不要恶语相加,不要以挖苦、讽刺的语言刺激对方。不要显示自己有高于人。不要论人是非,发泄牢骚。不要花言巧语,虚伪客套。不要插嘴、抢红。

与人交谈时应该避免哪些内容?

01 俚语、俗语

这些词语太随便,不宜在公众场合使用。

02 绰号

尤其是针对他人生理缺陷的绰号。这是对他人极大的不尊重。

03 侮辱性语言

这类词语无论以何种方式说出,都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。

04 卖弄语言

故弄玄虚、哗众取宠,把很简单的话绕着弯子说,变相讽刺别人。

05 性别歧视的语言

比如称呼女人“小姐”,或称呼男人为“小子”都是不礼貌的。

06 表示否定的话

如果有不同意见,可以委婉地说“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办法?”“可能我没想到”等。

07 涉及民族、宗教信仰或残疾的词语

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,应该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。对于残疾人我们应该予以更多的同情、关心,不要过于关注他们不幸的方面。

08 涉及隐私的内容

对方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不要刨根问底,谈到对方反感的问题应表示歉意。如年龄、收入、财产、个人经历等。

节选自中国工人出版社《农民工应掌握的66个礼仪修养常识》
编辑:吕贺 制图:吕贺

找律师太贵,找法援不易,找普通公民也有限制

“到底谁能当我的代理人?”

本报记者 杨召奎

“找律师,咨询费就要好几百元,写材料、出庭又得几千元。因为没钱请律师,我去北京市昌平区一家法律援助机构申请了法律援助,可对方便我没有公司盖章的任何证据,说帮不了我。最后,我找了一个懂法律的朋友帮我找证据、打官司。”12月20日,在京打工的仵同川接受《工人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说。

在这位刘姓朋友的帮助下,12月19日,仵同川向北京市昌平区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被立案。可没想到的是,在提交《授权委托书》的时候,他遇到了麻烦。“仲裁委说必须是律师或者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姐妹等近亲属才能当我的代理人,刘某不行。”

“亲属都不懂法律,到底谁能当我的代理人,为我打官司?”仵同川陷入了深深的困惑。

申请劳动仲裁,找谁代理?

仵同川老家在山东莱芜农村,2006年3月入职北京某印刷公司,主要从事双面印刷生产机长工作。2017年9月18日,他的生产主管经理突然口头通知他暂停工作回家休息,上班时会电话通知他。

“我因经理为啥停工,他也不详细说,就是政策原因,于是我们只好回家等电话。可直到12月12日,都没有人通知我具体上班时间,也不发放基本生活费。我去公司后才发现,厂房里空无一人,公司已经搬走了。”仵同川说,“后来,我去北京市昌平区劳动社会保障局查询,才知道从入职至今,公司一直没给我缴纳社会保险。”

因无钱请律师,申请法律援助也无果,仵同川找到刘某为他维权。除了基本的差旅费外,刘某没有向他收取任何费用。

在刘某的帮助下,仵同川向北京市昌平区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,要求解除与公司的劳动合同,并要求公司支付2017年9月18日至2017年10月18日期间的工资,2017年10月19日至2017年12月12日期间未安排工作的基本生活费,却遭遇了本文开头的一幕。

对此,北京市昌平区仲裁委有关负责人解释说,参照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八条的相关规定,刘某不能作为仵同川的代理人。

然而,刘某却表示,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普通公民不能代理劳动仲裁案件,而且他在不少地方都帮农民工代理过劳动仲裁案件,昌平区仲裁委的做法于法无据。

限制普通公民代理,是否合理?

根据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八条的规定,当事人、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。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:(一)律师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;(二)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;(三)当事人所在社区、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。

参照《民事诉讼法》限制劳动争议仲裁中的公民代理,是否合理?一位仲裁员对记者指出,“劳动争议实施准民事诉讼程序,参照适用《民事诉讼法》是可以的。另外,法律服务毕竟是专业化的社会服务,部分普通公民代理人业务素质不高,对法律一知半解就当代理人,在案件处理中出现了扰乱仲裁秩序等问题,反而不利于当事人。再者,黑代理的问题也比较严重,现在不少公民代理都是打着不收费

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。”

该仲裁员还表示,“其实,现行法律也是留有口子的,不是说完全禁止公民代理,近亲属、有关机构推荐的公民,依然是可以代理的。”

对此,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副院长、副教授沈建峰则认为,如果从法律规定来看,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并没有限制劳动争议仲裁中的公民代理,目前存在限制的地方,基本思路确实是比照《民事诉讼法》规定的,但其实是存在争议的。

“不过,从裁审衔接、劳动仲裁的准司法化定位,以及目前限制黑代理的需要出发,我觉得未来在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中,应该也会出现限制普通公民代理的规则。”沈建峰说。

没钱打官司,出路在哪?

农民工没钱请律师打官司,出路在哪?沈建峰认为,劳动争议处理中的代理问题可能需要做一些特别的安排。在有的国家,一定数额以下的劳动争议是不允许有代理人的,认为处理争议需要当事人共同讨论协商,而不是严格地适用法律。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,放开公民代理不是趋势。考虑到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和代理成本问题,可以引入败诉方承担一定数量的代理成本的规则。

北京大悦律师事务所律师梁宏刚表示认同。他指出,对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打官司,应该实行律师费转付制度,就是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律师费。实行这种制度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减轻农民工打官司的成本,另外一个好处是,会减少企业恶意诉讼的发生率,更能制约企业依法用工,并鼓励更多律师去代理此类案件。

北京市君本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飞建议,应允许遭遇侵权的农民工选择风险代理。“风险代理,

通俗理解就是打赢官司才支付律师费,但相关规定不允许律师对拖欠劳动报酬、工伤赔偿等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。为激励更多专业律师帮助遭遇欠薪、工伤的农民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,应修改《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,允许律师对欠薪、工伤赔偿等案件实行适度的风险代理收费,并将风险比例降低,比如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定标的额的10%。”王飞说。

而对于法律援助,《工人日报》记者了解到,各地司法局下属的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工会法律事务中心、社会法律援助中心均可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。

不过,一位不愿具名的公益律师告诉记者,“现在在很多农民工根本不知道或者不相信法律援助,再加上公益案件给律师的补贴很少,影响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,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进还任重道远。”仵同川申请法律援助的经历也表明,对于缺少证据的农民工,一些法律援助机构的积极性并不高,发挥的作用也有限。

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中心执行主任时福茂表示,一些农民工找不到法律援助机构,说明对法律援助的宣传还不够;而一些法律援助机构对于缺少证据的农民工,提供法律援助的积极性并不高,说明基层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还有待提高。

他对记者说,实际上,政府是下决心为弱势群体提供全面优质的法律援助的。当前我国正在加大政府购买法律援助服务的力度,逐步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补贴标准,相信法律援助的范围会越来越广,质量会越来越高。该中心一个律师一年一般能办理七八十个法律援助案件,有两个律师每年甚至能办理上百个案件,“欢迎农民工朋友向我们申请法律援助”。



重庆:

留守儿童的职业体验

12月26日,重庆合川三庙小学的6名留守儿童在国网重庆电力公司志愿者的带领下,来到主城天才梦工厂,通过现场角色扮演,体验了消防员、警察、厨师等职业。

图为留守儿童体验消防员职业。
周毅摄/中新社

春运未至,买票先行

广东:团体票让外来工吃下“定心丸”

本报记者 叶小钟

本报实习生 林观凤

本报特约通讯员 曾勇

“半个小时就办理好了资格登记,给公司300多名外来工吃了‘定心丸’。”12月14日是珠三角地区2018年春运外来工团体订票或自组团订票资格登记的最后一天,广州火车站是广铁集团设立的8个业务办理点之一,不少人在现场排队等候。

企业负责人:
“流程很方便,明年还会继续办”

“我是第一次代表公司来办理团体票,但公司已经连续为员工购买团体票好几年了。”来自番禺一家

企业的负责人郑女士告诉《工人日报》记者。

据了解,今年珠三角地区申请办理2018年春运外来工团体票的条件和去年一样,即用工规模不少于30人的企业,5名及以上外来务工人员自组团,且相同乘车日期、发站、到站车票每批次不少于5张。需提前准备好订票协议、申报表、企业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、用工证明原件及复印件、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材料。

在广州火车站现场设立的10个业务办理窗口前,每个窗口均有不少外来工或企业相关负责人在排队等候。自组团(企业)登记—资格审核—用户激活—上网校验,按照这个步骤,现场的办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

张先生所在的公司是第一次申请团体票。“我们从隔壁的企业得知可以为员工购买团体票,考虑到春节抢票困难,为了让员工安心,决定为他们购买团

体票。整个申请流程只花了十几分钟,非常方便,我们公司明年还会继续来办理的。”

自组团外来工:
“希望时间更自由,办理点更多”

据介绍,团体票现场受理时间为12月11日到14日。对此,自组团的陈先生觉得略短,“只有4天时间,而且只能在他们给我安排的半天时间内来办理,虽然这可能是为了限制人流,但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办法让我们自由选择时间。”

今年是陈先生第三年自组团购票,每次都和老乡一起结伴返乡的他今年也有七八个同伴。但他也坦言,今年一起买票的人又换了大半,因为各自的工作有变动,每次组团都有些麻烦。“不过,比春运抢票好多了。”

打工打到安哥拉

术人员培训方案中,有一条就是带安籍徒弟,就这样,刚来到安哥拉的彭其红遇到了他的3名“开山弟子”。

“在安哥拉打工,还得先学好一门外语!”彭其红说,第一次带外国徒弟,听起来很新鲜,但亲自做了才知道其中的艰难,仅语言沟通就让他碰了钉子,有时连比划,急得满头大汗,徒弟们还是直摇头。为教好安籍徒弟,50多岁的彭其红开始学习葡萄牙语,那段时间,每天晚上下班后都能见到他拿着葡语手册苦读的身影。3个月下来,从日常用语到专用术语,沟通逐渐不再成为问题,彭其红终于迈过了这道难关。

“好!”问及自己的中国师傅,所有的安籍修理工

都竖起大拇指。5年来,彭其红对徒弟们付出了真心,将自己参加工作多年来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倾囊相授,尊重他们的人格和风俗习惯,从未和任何一名徒弟发生过冲突。项目发放的补助基本都被他用于资助徒弟,每当徒弟遇到困难,他总会及时伸出援手,无论是指导工作、援助物资还是接济钱财他都无怨无悔。

有一次,彭其红见徒弟波尔德上班没有穿工装,询问之下得知是因为天气寒冷给了家人,彭其红没有批评他,而是将自己的旧衣服还有其他职工回国后留下的衣服清洗干净,分发给波尔德和其他有需要的安籍工人;徒弟扎西卡父亲病重,家境贫寒,经常急需

钱,彭其红得知后拿出自己的加班补助,并多次叮嘱他:“处理好家事尽快回来,修理班还需要你。”安籍小伙感动得流下眼泪,在此后的工作中更加卖力,成为了彭其红重要的工作助手。

“马上就是在安哥拉打工的第六年啦!打工也好,带徒也好,只要能为企业发展、为国家富强做点事,自己心里就觉得踏实。”彭其红在安籍徒弟们口中被亲切地称为“中国好师傅”,不仅赢得了徒弟的尊重,一些已经离职的徒弟也多次回到项目部看望他,彭其红对自己在安哥拉的生活格外满意,“打工打到安哥拉,这里也是我的家”时常被他挂在嘴边,成了他的口头禅。